

论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女性成长困境^①

——以《最蓝的眼睛》和《秀拉》为例

吴绍辉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20)

摘 要: 美国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一直十分关注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女性的成长。她早期的两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和《秀拉》描述了黑人女孩多面复杂的“成长困境”:成长引路人的缺失、黑人社区的分裂异变和父权制的桎梏。通过书写多重困境下黑人女性艰难的成长历程,莫里森对黑人女性乃至整个黑人民族的出路和发展进行了审视和思考。

关键词: 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秀拉》;女性成长困境;成长引路人;黑人社区;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6-0053-04

On the Initiation Inclemency of Females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

—— A Case Study of *The Bluest Eye* and *Sula*

WU Shao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20)

Abstract: As a female African-American writer, Toni Morrison always focuses her attention on the growth of the disadvantaged black females. Her early works, *The Bluest Eye* and *Sula* deal with the initiation inclemency of black girls, which includes the lack of initiation guide, the split of black community and the shackle of patriarchy. In this way, Toni Morrison examines and ponders on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females and ev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black nation.

Key words: Toni Morrison; *The Bluest Eye*; *Sula*; initiation inclemency of the females; guide of initiation; black community; patriarchy

托妮·莫里森(1931-)是当代美国文学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作家,她始终把美国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作为创作的主题,对他们的历史和生存状况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全方位的展示。同时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以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体验,深入到黑人女性的内心世界,向世人展示她们鲜为人知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图囿。她早期的两部小说《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和《秀拉》(*Sula*, 1973)都以黑人女孩为故事的主角,讲述了她们坎坷的成长历程。笔者试图从成长小说的

视角来解读这两部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成长困境”,并进一步分析莫里森对多重困境下黑人女性的成长乃至整个黑人民族的出路与发展所做的探讨。

一 成长引路人的缺失

成长引路人是成长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从正、反两方面丰富着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认知。在观察这些人扮演的社会角色过程中,青少年领悟到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

^① 收稿日期: 2010-07-25

基金项目: 广东工业大学校青年基金项目“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女性成长主题研究”(072069)

作者简介: 吴绍辉(1978-),男,湖北房县人,广东工业大学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式,逐渐确立自己的角色意识和生活方向”,^{[1]125}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黑人女孩,要想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下认识和构建自我身份,更需要成长引路人指点迷津。然而在这两部小说中,主人公却面临着正面成长引路人缺失的困境。

父母是青少年成长的主要引路人,在青少年陷入困境时给他们提供可以信赖的教育和引导,但佩科拉的父母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却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导向作用,这是导致她人生悲惨结局的重要原因。佩科拉的父亲从小就被父母遗弃,饱受种族歧视的迫害,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感,除了酗酒外,对其他一切事情毫无兴趣,对佩科拉也毫无关爱可言。“男性家长的关爱是黑人女性成长不可缺少的积极力量,女孩的成长,尤其是青少年时期,失去了男性家长的关怀,其成长必然遭受挫折。”^{[2]106-107}佩科拉的父亲不知道如何去关爱和引导女儿,其结果是混淆了爱和欲,给女儿的身体和精神的成长带来巨大伤害,在亲情与暴力、父爱与性爱的严重错位中毁掉了女儿。

佩科拉的母亲在白人强势文化的冲击下,逐渐认同和接受了白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厌恶排斥黑人文化。对于女孩来说,母亲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尤其重要,“在母亲的影响下,孩子们可以免受种族意识的侵害,建立起极强的自我意识和自爱的观念,从而抵抗种族意识的内化”。^{[3]117}这样一位深受白人价值观毒害的母亲,很难对自己女儿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在她身上佩科拉找不到任何可以效仿的东西,反而继承了她的分裂人格。面对女儿所经历的种种成长痛苦,佩科拉的母亲不仅没有给予应有的安慰关怀和精神庇护,反而鄙视厌恶女儿,甚至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划清自己同女儿代表黑人群体的界线。母亲对黑人文化的不认同,促使佩科拉不加分辨地接受白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母亲的嫌弃和不认可,加剧了佩科拉对“自我”的不认同和主体性的迷失,使她充满了“对成长的恐惧”,^{[4]102}陷入了更深的认同危机。由于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和指引,佩科拉只能在对“蓝眼睛”幻想中逃避痛苦的现实生活,最终走向精神分裂。

在另一部小说《秀拉》中,女主人公秀拉的外婆和母亲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同样起了负面的导向作用,秀拉的成长轨迹明显有着其外婆和母亲负面影响的痕迹。秀拉秉承了她们的傲慢跋扈和自我放纵,模仿了她们的行为规则,而且比她们做得更加极端。秀拉的外婆以自残的方式——轧断一只腿,来赚取保险金,维系家庭,她也以自残的方式——削掉指头,震慑进攻她的白人男孩子。秀拉的母亲

把自己的欲望作为行为的唯一准则,沉溺于乱性的世界之中,从母亲性事之后“脸上的幸福表情”秀拉领悟到了性事的愉悦,并认为:“性爱是愉悦而且随时可以进行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6]44}在母亲性爱观的影响下,成年后的秀拉过上了和母亲一样放纵的生活。12岁那年,秀拉无意中听到母亲和别人的谈话,“我爱秀拉,但我不喜欢她”,^{[6]57}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割裂了她们的母女之情。秀拉开始意识到母亲不可能在她认识自我和构建自我的道路上给予任何帮助。得不到母亲的指引,她只能以一种“非道德”的方式来寻找自我。“她尽可能频繁地与男人们上床,这是她发现自己所寻找的东西的唯一去处”。^{[6]122}在滥交的过程中,“她找到了自己,她迎接自己,她和她自己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6]123}这种以自我放纵、满足个人欲望来寻找个性独立和自我认同的叛逆生活,使她走向精神异化和自我分裂,最终得不到任何自我精神主体的成长与发展,同时由于背离了黑人文化传统,她只能在孤独中走向毁灭。

透过佩科拉和秀拉的成长悲剧,我们可以看出,理想家庭中的引路人形象在她们的生活中只不过是个梦想,没有了成长引路人的指点迷津,黑人女孩在白人种族主义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下,更容易迷失方向,更加难以获得心理和人格上的健康成长。

二 黑人社区的分裂异变

群体(社区)在传统的非洲文化中不仅仅是个体的生存空间,它还是黑人形成自我价值观念的有机体,是黑人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于黑人女性来说,黑人社区是她们广泛意义的黑人之家,构成了她们探索自我身份的社会层面,是她们成长的起点,在她们身份认同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家庭纽带对于受剥削和压迫的人们来说是唯一永久的支持体系”。^{[7]45}莫里森在很多作品中将她的小说人物置于特定的黑人群体(社区)当中,着力刻画社区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黑人社区对黑人青少年尤其是黑人女孩的潜移默化作用。但是她笔下的黑人社区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分裂异变,不再是黑人女性的精神家园,不再为她们的成长提供养育性的精神力量,对黑人女性而言,社区已经成了约束她们自我和个性发展的精神荒原。

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生活在一个和她一样遭受白人强势文化冲击和浸染的黑人社区,社区黑人的人格都不同程度地被异化扭曲,“肤色较浅的黑人会被认为具有更多的优越感,更容易被

主流文化所接纳,肤色较深的将会被族群所歧视和排斥”。^{[5]47}当黑人的自我在社会中得不到认同时,他们便开始通过在自己身上塑造白人的某些特征甚至是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的相对优越性来寻求心理上的慰藉。这种借助自我假想或他者所缔造出的优越感直接导致了社区黑人人格的扭曲和责任感的丧失,导致了黑人社区的分裂异变,促成了佩科拉悲剧的发生。

杰拉尔丁是肤色较浅的黑人,她时刻警惕着不与下层黑人们来往,并且能为和其他黑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感到骄傲;她以“有色人种”自居,认为“有色人种干净、安静;而黑鬼肮脏、吵闹”^{[6]71};在她眼里佩科拉之类的黑人小女孩并不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是肮脏、愚昧和贪婪的化身。她的儿子和佩科拉是同龄人,但却热衷于戏弄黑人小女孩,多次折磨并嫁祸于佩科拉。社区的牧师丘奇有着引以为荣的混血血统,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当万念俱灰,孤独绝望的佩科拉向他求助时,却被他无情地愚弄、欺骗和利用。他的冷漠自私给了佩科拉重重一击,导致她走向疯狂。

在佩科拉被生父强奸后,黑人社区有人感到恶心和震惊,也有人感到有趣甚至兴奋,但却没有人表示同情和宽容。“我们希望能听到‘可怜的孩子’或‘可怜的女孩’之类的话,但是没有听到,只见摇头。我们想找双盈满关怀的眼睛,却只见邪恶。”^{[4]148}社区从总体上麻木不仁,不伸出援助之手,不露出宽容的笑容,与佩科拉的悲惨结局不无关系。在佩科拉疯后,“我们所有的污垢,倒在了她身上,她默默忍受着。我们所有的美丽,源自于她身上,她带给大家”。^{[4]159}佩科拉给大家带来了“美丽”,是因为人们在她的“丑陋”和悲惨中看到了自己的“相对美丽”和“优越性”。当一个弱势群体用本群体的弱者来显示自己的美丽和优越性,其扭曲异变程度可想而知。小说结尾处的“那年全国的土地对金盏花都充满敌意”更是隐喻了黑人社区分裂异变后缺少温暖与关爱的荒原景象。

在小说《秀拉》中,黑人社区“既促成了秀拉个性的形成,又与秀拉的个性相抵触、相补充”。^{[5]49}对于她的种种“富有个性”的行为,黑人社区采取的是一种“绥靖”态度,“他们让恶随意蔓延,逞凶得势,从不设法改变它,消除它,或是防止其再度发生”,^{[6]89-90}这反映出了社区责任感的泯灭以及社区养育性和教育性力量的萎缩。表面上人们是在纵容她,实际上是在操纵和利用她,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督促他们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女人和男人们珍爱他们的丈夫和妻子,母亲真正担负起做母

亲的责任,修补自己的家庭”。^{[5]117-118}社区的纵容是“在精神层次上对秀拉的一种被动的消除,抹杀了秀拉建构自我身份的意义”。^{[8]288}黑人社区非但没提供养育性力量,反而成为一种内部的伤害,妨碍了黑人女孩自我身份的积极建构和身心的健康成长。

可见,两部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艰难成长与黑人社区(种族内部)的分裂异变不无关系。在种族主义和白人价值观的影响下,黑人社区已失去了家园的真正内涵,“其作为家庭内部共享空间应该具有的养育性力量已经被消解”,^{[8]274}黑人个体无法与社区建立和谐的关系,更无法在陷入困境后从社区获得救助,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黑人社区的分裂异变使得黑人社区在黑人个体生存和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在不经意中已经由保护者和养育者置换成了白人强势文化的“内部殖民者”,这使得黑人女性在饱受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同时,还要承受来自黑人种族内部的压制,成为“内在的他者”,^{[8]193}导致她们的成长更为艰难。

三 父权制的桎梏

“在女性成长小说中,‘女性’这一性别视角的切入,使得父权制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女性成长的性别境遇”。^[9]

佩科拉在父权制家长环境下长大,从小就饱受父权制思想意识的熏染,她在观察父母的性别角色中,认同了并接受了父权制下女性的气质和角色,将它作为认识自我、评价自我的文化心理的一部分。面对丈夫的殴打和虐待,佩科拉的母亲选择了顺从,甚至在丈夫的暴力中找到了生存的意义,这使得佩科拉意识到母亲处于一种“被动”和“服从”地位,认同了以此为基本特征的女性气质和角色,以致于她在面对杂货店老板的嘲笑奚落和同龄男孩的羞辱欺负时,选择了忍气吞声和消极忍受。

佩科拉的父亲在种族主义和白人文化的冲击下身心俱伤,小说在讲述完他所遭受的种种挫折和痛苦后,出现了他强奸佩科拉的一幕。“黑人男性是种族歧视的第一受害者”,要求“黑人女性充当医治黑人男性那受损的男性气概的辅助角色”。^[10]在白人世界中屡受挫折的黑人男性,会把这种沮丧感转嫁到更为弱势的黑人女性身上,希望在她们的身上能找到一种慰藉。佩科拉被迫履行了男权传统下规定的这一女性角色,成为受挫黑人寻找爱与自尊、医治心理创伤的牺牲品。

“父权制意识形态使女性置身于‘性别化的集体匿名凝视’中,这一凝视内含了一系列父权制社

会中有关女性道德和行为的评价模式,通过督促女性实践父权制意识形态标准来行使性别权力”,^[9]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男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与地位,可以对女性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进行界定,并根据自己的善恶标准和想象力来塑造女性,给她们贴上形形色色的标签,而女性则被要求处于被动,并按照男性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动。

小说《秀拉》中,在社区人看来,“好女人”应该是“像奈尔那样温柔体贴,一心相夫教子,视自己为丈夫的附庸”,这也正是父权传统对女性和女性行为准则的界定:女人首先是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而不是独立的个人,以相夫教子为生活的第一目标,同时兼备女性气质,按照男性的意志行事,处于附属的“他者”地位,女性存在的意义便是通过这种身份确认的。在这种“集体凝视”下,秀拉被贴上了“恶女”的标签,因为她伤风败俗,对朋友不忠,对长辈不孝,肆意玩弄男人,违背了社区的法规。而所谓的“社区法规”实际上是对社区女性的种种限制和类型化建构,是社区男性意志的体现。奈尔的丈夫裘德认为妻子是他“掩盖自己混乱不堪的衣服上的镶边,裙子的褶层”;他之所以和奈尔结婚是因为“结了婚,他就是一家之主”。可见女性的性别气质和性别角色早已被社区的男性所限制和规定,在他们眼里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物。当裘德向秀拉诉说了自己谋生的不容易时,期待秀拉能够给他些心理安慰,但秀拉却没有顺着他的话说,直接否定了他的观点,裘德为此勃然大怒,显然他认为秀拉大胆地冒犯了父权制的言语禁忌,触犯了男性中心话语的权威感,在父权制下,黑人男性掌握着话语权,黑人女性的话语权则被长期压抑或剥夺了。

佩科拉从小就饱受父权制思想意识的熏染和内化,并最终走向疯癫;奈儿按父权制下的道德规范来安排生活,成了没有独立价值的男性的附属品,导致自我意识泯灭,最终得不到成长;秀拉虽然在不断解构父权制对黑人女性的类型化构建,但在周围饱含父权道德意识的“凝视”中,她被异化成“恶”名昭著、人人不齿的典型,非但没有找到自我,还失去了亲情和友情,陷入了更深的孤寂,最终走向了自我分裂。由此可见,父权制意识形态已经严重束缚和阻碍了黑人女性的个性和自我的发展,成为她们主体性成长难以逾越的藩篱。

作为一名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一直都十分关注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女性的成长,尤其是女性青少年,因为无论从年龄、性别,还是种族的角度看,

她们都是最弱势群体,处于最边缘境地。通过《最蓝的眼睛》和《秀拉》这两部小说,莫里森向广大读者呈现了黑人女性艰难的成长历程。她们成长的“艰难”归因于身处的多面复杂的“成长困境”:成长引路人的缺失、黑人社区的分裂异变和父权制的桎梏。在这种境遇下,黑人女性很难正确地认识自我,无法构建有主体性价值的种族文化身份,因此也很难获得真正的“成长”。

写作也是莫里森选择、建构自我身份的一种行动策略和方式。通过书写黑人女性艰难的成长环境,莫里森对黑人女性乃至本民族的出路和发展进行了审视和思考。面对复杂的成长困境,佩科拉选择了逆来顺受,秀拉选择了过激反抗,她们选择的最终结果都是丧失了身份,迷失了自我,无法获得正常的成长。可见莫里森对这两种成长策略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她看来,不加分辨地认同和追逐白人文化以及完全摒弃脱离传统文化都不是黑人民族的发展出路。

参考文献:

- [1] 芮渝萍. 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2] Ruas, Charles. *Toni Morrison* [M]// Danille Taylor - Guthrie ed.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 [3] O'Reilly, Andrea. *Toni Morrison and Motherhood: A Politics of Heart*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 [4] Morrison, Toni. *The Bluest Eye* [M].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0.
- [5] 王守仁,吴新云. 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6] Morrison, Toni. *Sula* [M]. New York: Plume, 1973.
- [7] 贝尔·胡克斯.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 晓征,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 [8] 唐红梅. 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 [9] 翟永明. 成长·性别·父权制——兼论女性成长小说[J]. 理论与创作,2007(2):23-26.
- [10] Berger, James. *Ghosts of Liberalism; Morrison's Beloved and the Moynihan Report* [M]// Peach, Linden. *Toni Morrison—Contemporary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72.

责任编辑:黄声波